

孫中山與澳門的反袁驅龍運動

1913年暗訪澳門及其後的革命活動

何偉傑*

本文旨在論述澳門於1913 - 1916年間革命活動的重要性。當時，孫中山曾經到訪澳門，雖然宣稱此行“無心於政事”，事實上卻與陳炯明及朱執信討論反對袁世凱專權的計劃。及後陳炯明以廣東省為基礎反袁，澳門也成為其中一個組織並作為廣州及黃埔附近起義的基地之一。然而，澳門的一些革命者並非是中華革命黨會員，也可能並不直接聽命於孫中山。

孫中山暗訪澳門

孫中山回澳，不少參加過革命的同志都希望聯絡在袁世凱掌權前的“舊識”。當時身在澳門的革命黨人，“候舊識者”很可能包括：曾經去信要求任用的楊鶴齡，支持同盟會建立鏡濠閱書報社和光復廣州的盧怡若。孫中山則反客為主，“差書記”主動解釋此行“無心於政事”，亦即祇辦理私人事務，非為公事，然而實質上卻在進行一項與革命有關的秘密會談。

當時正在討伐袁世凱，孫中山要得到各省的實力派的支持。廣東是孫中山要爭取的對象。有報導云：

然十七日下午兩點，陳炯明由省乘江漢兵船來澳，於是日五句鐘到。孫遣一朱姓者請陳登岸。陳不允，力請孫下船面商。孫他命下船，談至深夜兩句餘鐘乃別，而陳亦即命啟輪返省。⁽¹⁾

這次澳門會晤十分秘密。陳炯明要等孫中山從上海到澳門一天之後，到他收到消息才立即乘軍艦到澳門沿岸，可見陳炯明十分重視自身安全，並沒有毅然前來。孫中山是希望和陳炯明在澳門陸上見面，“一朱姓者”明顯是陳炯明十分尊敬的朱執信。孫請他登陸他不願接受，反而堅持請孫中山上軍艦商討，從中可見陳炯明處於優勢，孫中山很可能是有求於陳炯明。究竟這九小時的談話內容是甚麼？陳炯明在討論結束之後於零晨兩點時立即回內地，可見談及的內容十分敏感，雙方不願公開。當然，陳炯明和孫中山的會談，不祇他們二人，雙方都有同伴在旁。從上文可知，至少還有朱執信，也應有其他人士。該消息三日後才見報：

聞所談者，是陳（炯明）因胡漢民之事難以接受。且胡（漢民）已於十七日乘寶璧輪赴港，故請教於孫（中山）如何辦法。至於（孫）中山之如何指教，則未之聞也。⁽²⁾

* 何偉傑，澳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多年從事有關香港、澳門歷史及文物研究，已發表二十多篇有關論文。

“聞所談者”所指：陳炯明要“請教於孫（中山）”那件“難以接受”的“胡漢民之事”，是指會談前六天（1913年6月14日）袁世凱下令罷免胡漢民之廣東都督兼民政長職務，改任遠離廣東及華北政局的“西藏布政使”！⁽³⁾換言之，袁世凱利用大總統的權力，把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元老調走。胡漢民在收到任命後三天到了香港。袁世凱任命陳炯明為新任廣東都督，一方面是為了加劇廣州革命政府內部的矛盾，希望以廣東都督為利誘，攏絡陳炯明以為己用，而胡漢民表面上表示同意。⁽⁴⁾廣州軍政府內部對這種安排意見分歧。朱執信曾經向陳炯明建議準備討伐袁世凱，被斷然拒絕。⁽⁵⁾

革命黨人要爭取廣東省成為反袁基地，非要孫中山親自和陳炯明面談不可。他們不可能採用信件或第三者傳話，這反映了內容的重要性和機密性。會談內容未有披露。孫中山的文集及陳炯明的著作也沒有記錄那九小時的會談內容。因此“（孫）中山之如何指教則未之聞也”的答案，祇可從往後在廣東發生的史事來推測。根據張釅村回憶，當時“中山先生委曲求全，親自到澳門約陳（炯明），藉巡視為名，與他在軍艦上見面，徵得陳炯明對四省獨立、廣東同時宣佈的同意”⁽⁶⁾。孫中山希望陳炯明響應革命。廣東遠離袁世凱控制的北方，難以實行直接控制；相反，革命黨人在廣東有深厚的基礎，孫中山希望以廣東為根據地發動武裝起義，推翻袁世凱的統治。結果，會談後不足一個月，即1913年7月18日，陳炯明在廣東省議會力主討伐袁世凱。經過反復討論之後，“出席議員一百二十二人”“公推陳炯明為‘廣東大都督兼討袁軍總司令’，如讚成者起立”，結果“全體起立通過”。⁽⁷⁾同一天陳炯明還“召集各師旅軍官商議獨立，至省議會宣佈政見，力斥袁世凱違背共和主張，與政府脫離關係。言時表示堅決，議員知無可商辯，唯唯應之。炯明於晚八時，出示佈告獨立”，並於同日宣佈舉義討袁。⁽⁸⁾

中華革命黨在澳門反袁驅龍

袁世凱、龍濟光掌政時期，澳門除了作為避難所及秘密會談的地點外，同時也是計劃向內地施加反擊的地方，一如1911年革命者在澳門計劃進攻廣州西關的情況。⁽⁹⁾龍濟光奉袁世凱之命解散廣東省議會及各縣議會，驅逐省都督胡漢民和副都督陳炯明，捕殺革命黨，於是革命者都認為對其非先加以討伐不可。不過澳門政府與龍濟光的關係十分良好，從1913年11月25日龍濟光與美珊智（Aníbal Augusto Sanches de Miranda，今譯美蘭德）之間的電報通訊可知雙方在邊境保安上的關係：

總督鑒：香山縣屬之前山（Chin-San）地方向有軍隊駐紮，今因無兵在彼，據該處居民呈報，有零星散匪藏匿滋擾，請兵保護，特派濟軍（Chai Cuan）一營前往填防。其地與尊處接近，故特電聞。廣東都督（Governador Geral de Cuong Tung）龍濟光（Long Chai Cuong）敬。⁽¹⁰⁾

澳督美珊智的回應亦十分合作：

廣東都督鑒：敬電見示之事感甚。濟軍填防前山，澳政府所能供給之協助，該營長儘可商辦。美珊智敬。⁽¹¹⁾

可見當時澳門政府與龍濟光是互相信任的。龍濟光也知道被通緝的革命者可能在澳門，因此在1914年3月27日由廣州發出命令要求驅逐朱執信（Chu-Chap-Son）、鄧鏗（Tang Kin）、謝英伯（Chea-Ying-Pak）及岑學侶（Sham Hok Lu）。但是從檔案中卻未見廣州方面提供革命者住所的材料，反映了當時龍濟光也未掌握革命者的行蹤。⁽¹²⁾

1914年7月，孫中山在東京組織中華革命黨繼續討伐袁世凱和龍濟光。⁽¹³⁾以廣東省為根據地之一的革命黨人認為，當時控制廣東省的龍

濟光是袁世凱的親信，尤其在1915年12月11日袁世凱稱帝後，冊封龍濟光為“一等公”並晉封為“郡王”。朱執信更認為：“袁氏非真得國民心理之扶助，且非特不有之於現在，亦不能有之於將來。”⁽¹⁴⁾

袁世凱迫害革命黨時期，不少原同盟會的反清同志在討伐袁世凱時，選擇獨立組織革命團體，不願加入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根據周聿峇、陳紅民的研究，甚至緊隨孫中山的胡漢民也遲至1914年5月1日才正式加入中華革命黨。⁽¹⁵⁾前眾議院議員鄒魯於1914年8月在香港設立革命機關。雖然他也曾與朱執信和鄧鏗合作籌劃廣東省內的武裝起義，但鄒魯堅持獨自活動，不加入中華革命黨。⁽¹⁶⁾澳門同盟會分會負責人之一的林警魂也沒有加入中華革命黨，甚至沒有積極參與反袁世凱的革命活動。澳門的革命活動由另一位當初沒有參加中華革命黨的國民黨黨員朱執信繼續維持，以澳門為反袁世凱的基地。⁽¹⁷⁾1901年，朱執信留學日本時曾接觸馬克思主義，並於1905年在《民報》發表〈德意志革命家小傳〉，介紹馬克思的生平和學說，還節譯《共產主義宣言》第二節的“十條綱領”。⁽¹⁸⁾因此，朱執信被指是“最早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為漢文，所譯《共產黨宣言》早於陳望道數年”⁽¹⁹⁾。這也可以理解為是馬克思主義信徒在澳門活動的先聲。⁽²⁰⁾

朱執信的會員身份與設立澳門秘密機關

1913年9月16日，龍濟光“奉大總統令開”，發現警察廳長陳景華“附和亂黨，密謀煽亂，在於省港分設機關，與朱執信等秘密往來，陰謀設計，暗儲餉項，私製軍裝，招集匪類”。由此可知，龍濟光對革命黨在廣州及香港有相當的了解，因此朱執信如果要討袁，必須在澳門進行。⁽²¹⁾朱執信自1914年秋天在澳門居住，進行反袁工作，但具體情況如何，有些研究祇是略為提及，甚至付之闕如。⁽²²⁾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為朱執信本人在討袁期間及事後，也沒有專文談及他這個

時期在澳門的生活。⁽²³⁾朱執信認為：反對袁世凱必先討伐廣東龍濟光，並就此曾向孫中山請示。⁽²⁴⁾不過，孫中山卻要求朱執信先加入中華革命黨，才會指派他回廣東主持革命工作。加入中華革命黨和加入同盟會不同，中華革命黨會員要宣誓向孫中山個人効忠，還要蓋手指模作實，這令不少原同盟會會員不願接受。最著名的例子是黃興和章太炎也因此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朱執信也不願意接受，於是“執信以自己既曾入同盟會”為理由，堅決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²⁵⁾孫中山改派李海雲負責廣州的革命工作，鄧鏗在東江討伐龍濟光，開展中華革命黨在廣東的反袁活動。⁽²⁶⁾朱執信在這種情況下也“自動回粵，進行革命”。⁽²⁷⁾

當時的澳門政府以北洋政府為正統政府。在澳門歷史檔案藏有他們外交禮節的交往記錄，例如1914年9月18日5時15分米那（José Carlos da Maia）由澳督府拍發賀電，經廣州葡萄牙領事館向當時廣東都督表達慶祝中華民國總統就職週年紀念日。⁽²⁸⁾當時的總統正是袁世凱（Iuan-Chi-Kai），控制廣東政局的龍濟光正是他的親信。

朱執信以國民黨黨員身份組織革命工作。孫中山也明白朱執信的想法，於是派他任職秘書，與廣東中華革命軍參謀長的李朗如以及侍衛副官黃夢熊等，先到香港再往澳門建立基地，協助討伐龍濟光。⁽²⁹⁾因此，朱執信在澳門準備革命工作時的同志，不少人聽命於孫中山。當時的革命者中有同盟會、國民黨或中華革命黨的成員，他們也可以共同合作，對抗龍濟光。1914年10月及11月，鄧鏗曾在惠陽、潮安、曲江、增城和龍門等廣東東北各縣動員民軍起義；朱執信則在廣東西南各縣，如番禺、花縣、清遠、南海、順德、恩平、開平、新會、陽江、陽春和茂名等地動員會黨。⁽³⁰⁾胡漢民曾概括指出，當時朱執信主要是“被派往港澳一帶，謀助西江同志起事”⁽³¹⁾。1915年，朱執信響應孫中山到澳門組織反袁運動，“由於避免葡政府及龍（濟光）探之注意，地點分散，因

應環境，常作變動。”⁽³²⁾ 因此朱執信在澳門的哪個地方定居，似乎難有定說。

三路進攻廣州計劃

1915年12月11日袁世凱稱帝。革命黨人聲討其破壞共和體制：蔡鍔首先從北京秘密逃回雲南，於12月25日組織護國軍起兵討袁；李烈鈞率領雲南護國軍第二軍進攻廣東；龍濟光調精銳部隊往廣東西部防備。朱執信在澳門也招募會員，如“雪堂詩社”成員古桂芬及馮秋雪等。⁽³³⁾ 朱曾向陳炯明建議聯兵討伐袁世凱，並在澳門荷蘭園32號舉行會議。但他們都“堅持己見，力主各攬各的”，結果沒有成效。⁽³⁴⁾

朱執信發動起義，驅逐龍濟光。朱執信在廣東組織革命黨人四千人，分三路偷襲廣州。第一路由澳門出發，經增城、羅崗洞、龍眼洞進攻廣州小北門；第二路沿廣九鐵路，“喬裝藏械，沿途上車”，進攻廣州東關。第三路由綠林首領謝細牛率領，由番禺石湖村出發，突襲兵工廠。⁽³⁵⁾ 弗里曼曾形容朱執信在廣東的革命運動是“游擊戰革命分子”(guerrilla revolutionaries)，因為朱執信的革命計劃中主要力量是武裝的游動農村土匪。⁽³⁶⁾ 朱執信計劃“奪得槍械，便武裝綠林，分兩路夾攻省城的西關和大北門，以為東北兩軍的策應”⁽³⁷⁾。

1916年2月5日，朱執信率革命黨數十人由澳門出發潛入番禺石湖村。當時“村中已先有謝細牛所部綠林數百人和民軍千餘人，而清遠、花縣、東莞各方面有綠林數千人，也約定8日來會”，準備進攻廣州。⁽³⁸⁾ 但是，人數眾多，品流複雜，“村中奸細向敵軍告密”。龍濟光獲悉他們將在2月9日在番禺石湖村起事，故早作防範。⁽³⁹⁾

1916年2月8日黎明時分，屯駐番禺石湖村的朱執信及數十名革命者，“突然遭到龍濟光所派炮兵團長田春發率領的精兵兩營來攻”⁽⁴⁰⁾。雙方血戰兩晝夜至2月9日清晨，濟軍炮兵團營長田春發前來增援，中華鐵血團先鋒隊長周碩與二百多

名革命者截擊於沙梨園七板橋，將田春發、營長吳仲鳴和排長等共五人擊斃，但濟軍炮火猛烈，周碩中彈陣亡。最後“(朱)執信才下令撤退。攻敗垂成，殊為可惜。”這次起義雖然失敗，卻動搖了部分廣州守軍的志氣：第一師炮兵團連長、排長各一人、炮兵數十人無故失蹤，令龍濟光大為震驚。⁽⁴¹⁾

夜劫“肇和”號兵艦

朱執信沒有因失敗而放棄討袁反龍的立場，祇是改變了武裝起義的策略。首先，朱執信為下一次起義而“親往南洋籌款”；但當朱執信“要求鄧澤如撥款接濟”時，卻因不是中華革命黨黨員而被拒絕。鄧澤如亦乘機勸朱執信入黨⁽⁴²⁾，朱執信終於接受勸告，於1916年11月“由南洋直往東京，晉謁孫中山，報告討龍失敗經過，並完成入中華革命黨手續。旋返澳門。”⁽⁴³⁾ 孫中山委任朱執信為中華革命軍廣東司令長官，以鄧鏗為其副手，並得到大批革命經費。⁽⁴⁴⁾ 朱執信與古應芬(原廣東都督府參事)、李朗如(原廣惠綏靖處會辦)、張發奎、薛岳和李揚敬等革命同志，繼續以澳門為指揮基地，在廣州附近十幾個縣溝通軍隊，進行聯絡工作，等待下次起義的時機。⁽⁴⁵⁾ 當時各路民軍領袖亦多避難於澳門。⁽⁴⁶⁾ 朱執信在澳門非常低調，中華革命黨黨員也不一定見到他。據馮秋雪回憶，他參加澳門中華革命黨機關後，仍未能面見朱執信，可見當時朱執信的作風極其隱密。⁽⁴⁷⁾

在朱執信等突襲後，龍濟光感到廣州仍然受民軍所威脅。“電求袁世凱派軍艦來粵坐鎮，以壯聲勢。”⁽⁴⁸⁾ 袁世凱也明白廣東的局勢危急，於是在1916年12月3日運兵南下，並打算派停泊長江、駐守上海一帶的“肇和”號兵艦於12月6日南下廣東，鎮守黃埔江以保衛廣州城安全。上海反袁革命黨人留意到“肇和”號兵艦的去向，身在上海的陳其美便打算策劃“肇和”號兵艦起義。陳其美的總機關設於上海法國租界的霞飛路

漁陽里5號，由蔣介石負責軍事，吳忠信掌管財政，楊庶堪任總務。陳其美先與“肇和”兵艦艦長黃鳴球以及練習生陳可鈞等聯絡，計劃12月5日起義，由楊虎率領革命黨人接收“肇和”兵艦，繼而轟擊製造局。當時由陳其美和蔣介石指揮作戰，但袁世凱在上海駐兵眾多，革命軍在缺乏後援的情況下以失敗告終。

上海中華革命黨黨員戴傳賢有見及此，“派邵元沖攜函來澳門與朱執信會商劫持肇和艦事”⁽⁴⁹⁾；在上海騎劫“肇和”號兵艦失敗後逃脫的楊虎，也從上海到廣東。陳其美及朱執信把楊虎、馬伯麟、成創周、溫生和李天德等革命同志收編到李天德創辦的敢死隊“中華鐵血團”和羅立志、張民達、羅清等南洋華僑構成的“華僑決死隊”之下⁽⁵⁰⁾。約定由邵元沖、楊虎負責“指揮劫持肇和艦”，朱執信負責“發動民軍回應和接濟劫持肇和艦同志的武器”。⁽⁵¹⁾但在朱執信召集各路民軍首領商議時——

各首領以元氣未復，彈械缺乏，有難色。執信告以滬上同志在滬劫持肇和艦失敗後，尚且不辭勞苦，追蹤南來，繼續舉義，吾人更應打破困難，與滬來粵同志合作，發揚革命精神，完成討龍任務。⁽⁵²⁾

各路民軍首領這才“紛紛回鄉，準備響應”。各路民軍首領在突擊廣州一役後，裝備及士氣大不如前，他們也沒有和上海的革命黨楊虎等合作的經驗，要完成這事出突然的任務並不容易。

朱執信根據澳門的情況，組織陳策、楊虎、馬伯麟等人，率領敢死隊起義。1916年3月6日晚上，廣東中華革命黨人分海陸兩路在黃埔截擊“肇和”號兵艦、長洲炮臺及魚珠炮臺。李天德指揮的“中華鐵血團”陸上部隊，順利攻下魚珠炮臺，但圍攻長洲炮臺的計劃卻未能成功。⁽⁵³⁾海路方面，朱執信打算利用他對澳門地理的認識，在當晚夜襲剛到步的“肇和”號兵艦。朱執信留意到了——

當時由澳開往廣州的夜輪有兩艘：一艘懸葡萄牙國旗，一艘懸中國旗。在澳同志乃決定劫持懸中國旗的一艘，以為攻襲肇和艦之用。⁽⁵⁴⁾

朱執信選擇從“懸中國旗”的那艘“開往廣州的夜輪”“永固”號入手，很可能是“懸中國旗”的乘客主要是中國人，革命黨人無須面對葡萄牙乘客的懷疑；也因朱執信已爭取駕駛該夜輪的船員加入革命行列。朱執信首先安排“各同志則裝扮成商人、小販登輪”，而“槍彈由鄧彥華負責帶上輪，暗交輪上同志”⁽⁵⁵⁾。他們本來的計劃是跳到“肇和”兵艦，向兵艦投擲炸彈，騎劫成功後再把軍艦駛入珠江，炮轟屯駐廣州的龍濟光部隊。

當晚計劃行事頗為順利，“輪抵黃埔時，尚未破曉”，亦即在3月7日凌晨時分。⁽⁵⁶⁾“永固”號駛近黃埔時，“擔任駕駛的同志，即將舵樓劫奪；駕輪接近肇和艦。”⁽⁵⁷⁾不過，革命黨人卻沒有在事前預測珠江水流的變化——

時適珠江潮退流急，把舵不靈，幾次都不能靠近，卒為肇和艦上值勤員兵發覺，鳴號告警。襲艦計劃，遂告失敗。⁽⁵⁸⁾

當晚珠江潮退，水流湍急，“永固”號輪離“肇和”兵艦遠，不少革命黨人未能跳到“肇和”兵艦而墜海犧牲，也有黨人被“肇和”兵艦的哨兵射殺。馮杏坡、溫生、湯伯和、鄭幕開和李定等革命黨人犧牲了。“裝扮成商人、小販”的黨人可能感到這次“都不能靠近”，被“肇和”號兵艦發現形跡可疑時，“行動迅速”，把鄧彥華發給他們的武器“暗投水中，未被船員發覺”。當時形勢危急，“肇和艦令該輪停航檢查，見無異狀，輪上同志始安全脫險。”起義失敗，但保存了部分革命同志的生命，可惜喪失了武器和起義的機會。

小 結

朱執信等人在1914-1916年間以澳門為基地，計劃突襲廣州及黃埔。⁽⁵⁹⁾ 國民黨籍的朱執信在沒有加入中華革命黨的情況下，仍得到部分同盟會會員支持，但力量有限，必須依賴綠林和被遣散的民軍。首次突擊廣州的計劃失敗後，朱執信才加入中華革命黨，爭取更多的革命同志協助。自國民黨被袁世凱解散、龍濟光通緝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之後，澳門成了他們的容身之所。朱執信在澳門深居簡出，不再像1911年革命者公開剪辮或政治集會時那樣子。

與反清革命相比，廣東省同樣不是在革命黨人能夠控制的地區。辛亥革命後，絕大部分曾經出任政府公職的革命者已經成為知名人士，名列通緝名單，他們不能在與龍濟光友好的澳葡統治下進行公開活動，也因此加深了同志間溝通的困難。兩次起義的計劃未有深思熟慮，參加起義而殉難的中華革命黨黨員很多英年早逝，在革命史上寂寂無聞。這正好反映了他們是新近參加反袁革命的，不是具有豐富反清經驗的革命志士。1916年10月6日，龍濟光在袁世凱倒臺後卸任廣東督軍，率領殘部軍隊退出廣州，逃往海南島，驅逐龍濟光的目的才算達到了。

【註】

- (1) (2)〈孫中山返澳〉，載《華字日報》，1913年6月23日。
- (3) 蔣永敬編著《民國胡展堂先生漢民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12輯”。有關胡漢民的研究，可參考劉義章教授的多篇研究成果，包括〈胡漢民在辛亥革命所扮演的角色〉、〈胡漢民的社會主義思想〉、〈胡漢民與第一次國共兩黨合作的終結〉等論文，收入氏著：《中國現代化的起步》（香港：華風書局，1995年）。其後，劉義章教授亦發表〈辛亥革命與中國政治現代化：以胡漢民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來論述〉，載南京紀念辛亥革命9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編：《辛亥革命與中國現代化道路：南京紀念辛亥革命9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The 1911 revolution and China's modernized road: a collection of papers of Nanjing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Nine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Revolution），（南京：民國檔案雜誌社編印，2001年），頁59-68。而有關胡漢民最全面的研究，詳見Lau, Yee Cheung（劉義章），*Hu Han-min: A Scholar-revolutionary in Contemporary China*（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未刊博士學位論文，1986年）。有關1930年代的胡漢民研究，可參考陳紅民：《函電裡的人際關係與政治：讀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胡漢民往來函電稿”》（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

- (4) 〈胡都就推薦陳炯明代理廣東都督電〉，原載郭孝成《中國革命紀事本末》，亦載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2編，《辛亥革命與民國建元》，第4冊，〈各省光復〉，頁467。
- (5) 朱秩如：〈朱執信革命事蹟述略〉，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辛亥革命史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448。
- (6) 張豫村：〈辛亥革命前後同盟會領導人物的政治分歧及其分裂〉，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辛亥革命史料》（廣東：新華書店，1962年），頁365。
- (7) 〈宣佈廣東獨立詳情〉，《華字日報》，1913年7月21日。
- (8) 〈廣東宣佈獨立〉、〈粵省全體軍界宣佈一致討袁〉，載黃季陸編：《革命文獻》，第44冊，《二次革命史料》（臺北：中央文化供應社經售，1953年），頁291-293。
- (9) 詳見本論文第三章：“集會與策劃光復之地”第二節：“香山起義：從澳門到光復石岐、進軍廣州西關”。
- (10) 澳門民政廳（Serviços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檔案，“Comunicação do Governador Geral de Cuong Tung, Long Chai Cuong, de que havia Mandado um Regimento de Chai Cuan para Chin-San”（《廣東都督龍濟光的已經派遣一隊濟軍駐紮前山的通訊》），1913/11/25, AH/AC/P-4263, p. 2.
- (11) 澳門民政廳（Serviços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檔案，“Comunicação do Governador Geral de Cuong Tung, Long Chai Cuong, de que havia Mandado um Regimento de Chai Cuan para Chin-San”，1913/11/25, AH/AC/P-4263, p. 8.
- (12) 澳門民政廳（Serviços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檔案，“Extradicação Pedida pelo Governo de Cantão de Chu-Chap-Son, Tang Kin, Chea-Ying-Pak e Sham Hok Lu”（《廣東政府要求驅逐朱執信、鄧鏗、謝英伯及岑學路（音譯）》），1914/3/27-1914/3/30, AH/AC/P-4388, p. 2。類似的要求亦見於澳門民政廳（Serviços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檔案，“Pedido dos Governos de Hong Kong e de Cantão para ser Expulso de Macau o Conhecido Chefe dos Revolucionários, Chan Kueng Meng”（《香港政府及廣州政府要求從澳門驅逐著名革命領袖陳炯明》），1916/1/6-1916/1/28, AH/AC/P-

5123. 澳門民政廳 (Serviços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 檔案, “Extradição Pedida pelo Governo de Cantão, do Chinnês Vong Meng Tong” (《廣州政府要求驅逐華人黃明堂》), 1915/03/02 - 1916/5/9。
- (13) 根據學者呂芳上的研究, 中華革命黨在1913年9月至1914年7月的會員人數, 祇有692名。詳見呂芳上: 《朱執信與中國革命》, “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叢書·79”(臺北: 東吳大學, 1978年), 頁160。
- (14) 朱執信: 《革命與心理》, 載廣東省哲學社會科會研究所歷史研究室編: 《朱執信集》(北京: 中華書局, 1979年), 頁203。
- (15) 周聿寰、陳紅民: 《胡漢民評傳》,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9年), 頁112-113。
- (16) 鄒魯: 《回顧錄》(臺北: 三民書局, 1974年), 第1冊, 頁74。
- (17) 詳見〈中山先生致李源水函〉, (1914年10月9日), 《國父全集》, 第4冊, 頁298-299頁楊文: 〈朱執信先生事蹟述遺〉, 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史料專輯》(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1年), 頁449。
- (18) 朱執信: 〈德意志革命家小傳〉, 載廣東省哲學社會科會研究所歷史研究室編: 《朱執信集》, 頁12-14。
- (19) 楊文: 〈朱執信先生事蹟述遺〉, 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史料專輯》, 頁312。
- (20) 毛澤東曾經指出: 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以前有人如梁啟超、朱執信, 也曾提過一下馬克思主義。(……) 朱執信是國民黨員, 這樣看來, 講馬克思主義倒還是國民黨在先。不過以前在中國並沒有人真正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詳見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1945年4月21日), 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毛澤東文集》(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第3卷, 頁290。
- (21) 〈龍濟光槍殺陳景華、陳仲賓〉, 載黃季陸編: 《革命文獻》, 第44冊, 《二次革命史料》(臺北: 中央文化供應社經售, 1953年), 頁298-299。
- (22) 例如謝霜天在〈朱執信先生年表〉中, 指出1915年朱執信“主持澳門機關部”, 而沒有提及具體活動。詳見謝霜天: 《虎門遺恨: 朱執信傳》, “近代中國叢書·先烈先賢傳記叢刊”(臺北: 近代中國, 1979年), 頁148。但是, 根據朱秩如的回憶, 朱執信來到澳門的年分應為1914年秋天, 詳見朱秩如: 〈朱執信革命事蹟述略〉, 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廣東辛亥革命史料》(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1年), 頁449。至於Edward Friedman, *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更是全書沒有提及過中華革命黨或朱執信在澳門的活動。
- (23) 筆者曾經查閱朱執信的幾部文集, 也未見他提及在澳門的生活, 例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 《朱執信先生文集》(臺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1985年)。
- (24) 李朗如、陸滿: 〈從龍濟光入粵到粵軍回師期間的廣東政局〉, 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廣東文史資料》, 第1輯, 上冊, 頁16-30及張瑛: 《朱執信評傳》(鄭州: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0年), 頁141。
- (25) 李守孔: 《南洋華僑與討袁運動, 1914-1916》(香港: 當代亞洲研究中心, 1987年), 頁7。
- (26) 事實上他們早在光復廣東時早已認識, 詳見〈鄧鏗傳〉, 載《革命人物志》, 第7冊, 頁333-349。
- (27) 尚明軒: 〈朱執信傳略〉, 載氏著: 《孫中山與國民黨左派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年), 頁291。
- (28) 澳門民政廳 (Serviços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 檔案 “O Governador de Macau Felicita o Governador de Cantão pelo Dia do Aniversario do Presidente da Republica Chinezta” (《澳門總督祝賀廣東都督關於中華民國總統就職週年紀念日》), 1914/9/18-1914/9-22, AH/AC/P-4614, p. 1-3。
- (29) 黃夢熊、汪祖澤、朱秩如、楊曉風、沈祥龍: 〈朱執信傳略〉, 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1年), 頁189及李敬如、江琴: 〈李朗如傳略〉, 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廣州文史資料選輯》, 第25輯, 頁240-249。
- (30) 〈討龍之役鄧鏗報告書〉, 載鄧澤如: 《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跡》(上海: 正中書局, 1948年), 頁145-146及〈討龍之役朱執信報告書〉, 載鄧澤如: 《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跡》, 頁147-155。
- (31) 胡漢民: 〈朱執信先生的生平——17年9月21日中央黨部朱執信先生殉國八週年紀念日演講詞〉, 載周康燮(存萃學社)編: 《胡漢民事蹟資料彙輯》, “歷史人物資料叢編·7”(香港: 大東圖書公司, 1980年), 第4冊, 頁1334。
- (32) 羅翼群: 〈有關中華革命黨活動之回憶〉, 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廣州文史資料》(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79年), 第11輯, 頁18。
- (33) 馮秋雪: 〈中華革命黨澳門“討龍”活動雜憶〉, 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廣州文史資料》, 第11輯, 頁44。“雪堂詩社”的成員的詩作, 詳見《詩聲: 雪堂月刊》(*La Voce de la Poema*) (澳門: 澳門雪堂書社, 1916年7月至1920年5月)。
- (34) 馮秋雪: 〈中華革命黨澳門“討龍”活動雜憶〉, 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廣州文史資料》, 第11輯, 頁46。

- (35) 〈朱執信〉，原載黨史會編：《革命先烈傳記》，1941年9月於重慶出版，亦載黃季陸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輯：《革命人物誌》（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經銷，1983年），頁337及〈朱執信經營粵事史略〉，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革命文獻》（臺北：中央文化供應社經銷，1953），第47輯，〈討袁史料〉（二），頁354。呂芳上：《朱執信與中國革命》，“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叢書·79”（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8年），頁194。
- (36) 可參閱 Edward Friedman, *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 132.
- (37) 黃夢熊、汪祖澤、朱秩如、楊曉風、沈祥龍：〈朱執信傳略〉，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頁188。
- (38) 朱執信和民軍的關係似乎十分和洽，胡漢民曾回憶當年朱執信：“如辛亥年在廣州時，他指揮的民軍，有十幾萬之多，後來都由他親手解散了，而十幾萬人中，沒有聽說有怨恨他的。”詳見胡漢民：〈朱執信先生的整個人格——18年9月21日——中央黨部朱執信先生殉國九週紀念會〉，載周康慶（存萃學社）編：《胡漢民事跡資料彙輯》，第4冊，頁1340。
- (39) 黃夢熊、汪祖澤、朱秩如、楊曉風、沈祥龍：〈朱執信傳略〉，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頁188。
- (40) 黃夢熊、汪祖澤、朱秩如、楊曉風、沈祥龍：〈朱執信傳略〉，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頁189。
- (41) 黃夢熊、汪祖澤、朱秩如、楊曉風、沈祥龍：〈朱執信傳略〉，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頁188；何伯言編著：《朱執信·廖仲愷》（南京：青年出版社，1946年），頁12-13。
- (42) 黃夢熊、汪祖澤、朱秩如、楊曉風、沈祥龍：〈朱執信傳略〉，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頁190。
- (43) 黃夢熊、汪祖澤、朱秩如、楊曉風、沈祥龍：〈朱執信傳略〉，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頁189。
- (44) 楊文：〈朱執信先生事跡述遺〉，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史料專輯》，頁309。
- (45) 羅翼群：〈有關中華革命黨活動之回憶〉，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頁18；〈中華革命黨委派人員住址及回國人員姓名錄〉，《革命文獻》（臺北，中央文化供應社經銷，1953年），第45輯，頁296。
- (46) 朱秩如：〈朱執信革命事跡述略〉，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辛亥革命史料》，頁494。
- (47) 馮秋雪：〈中華革命黨澳門“討龍”活動雜憶〉，載《廣州文史資料》，第11輯，頁41。
- (48) 尚明軒：〈論朱執信的政治思想〉，載氏著：《孫中山與國民黨左派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95。
- (49) 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朱執信〉，載黃季陸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輯：《革命人物誌》（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9年），第1集，頁330。
- (50) 羅翼群：〈有關中華革命黨活動之回憶〉，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頁19。
- (51) 朱秩如：〈朱兄執行行狀〉，載黃季陸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輯：《革命人物誌》（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9年），第1集，頁346。
- (52) 〈朱大符（執信）先生傳略〉，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朱執信先生文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年），上冊，頁4。
- (53) 羅翼群：〈有關中華革命黨活動之回憶〉，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頁19。
- (54) 季陶（戴季陶）：〈懷朱執信先生〉，載黃季陸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輯：《革命人物誌》（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9年），第1集，頁350。
- (55) 楊文：〈朱執信先生事跡述遺〉，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史料專輯》，頁309。
- (56) 朱秩如：〈朱兄執行行狀〉，載黃季陸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輯：《革命人物誌》（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9年），第1集，頁346。
- (57) 黃夢熊、汪祖澤、朱秩如、楊曉風、沈祥龍：〈朱執信傳略〉，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頁189。
- (58) 〈朱大符（執信）先生傳略〉，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朱執信先生文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年），上冊，頁4。
- (59) 朱秩如：〈朱執信革命事跡述略〉，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辛亥革命史料》，頁450。